

文化漫谈

Essay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y

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

何兆武

著

朗
朗
书
房
·
文
化
要
义
丛
书

不同的历史文化是客观存在的
然而如何评价、发扬或改造
历史上已形成的文化
则全靠我们作为
历史主体的认识和努力
这正是文化比较研究的
现实意义之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化漫谈

Essay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y

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

何兆武 著

朗
朗
书
房
·
文
化
要
义
丛
书

不同的历史文化是客观存在的
然而如何评价、发扬或改造
历史上已形成的文化
则全靠我们作为
历史主体的认识和努力
这正是文化比较研究的
现实意义之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漫谈: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何兆武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文化要义丛书)

ISBN 7-300-06056-0/G·1217

I.文…

II.何…

III.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280 号



文化要义丛书

文化漫谈——思想的近代化及其他

何兆武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6.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7 000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这本小书里所收集的,主要是近年来应同学们之邀所作的有关文化的几次谈话。文化当然是一个大题目。考虑到听众是属于各个不同专业的本科同学,所以我把范围缩小到只谈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并且内容也尽可能地通俗,避免渲染上学术论文的色彩。又因为前后几次的听众不同,而主题基本上是同一个,所以各篇内容是不可避免地多有重复。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另有两篇附录,其内容大抵也与本书内容有关,现附于文后仅供参考。

历史行程所描扫出的轨迹呈现为一条曲线。它那坐标的两个轴:一个轴是自由(即人的意志和努力),一个轴是必然(即自然界的必然律)。两者互相制约和交相作用的结果,就呈现为历史行程的那条曲线。历史研究的要义就在于不但要追溯历史行程的路线,而且还要阐明其所以

然,也就是它背后的意义,——假如说历史终究是有什么意义的话。暮年观道,迷惘之余所见多谬,倘蒙读者指正,不胜欣幸。

本文是由听讲的几位同学记录和整理的,由我在文字上略加修订。其间承友人吴兴元先生热心协助编排,友人张丽艳女士整理和打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多方操持,并此致谢。

作者谨识

2004 年秋,北京清华园

关于本书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何兆武先生在清华大学针对本科生有关文化问题的谈话与讲演,主要是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历程。

全书共分九讲,每讲集中探讨一个问题,从对西方文化史的介绍切入,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涉及的知识面甚广,所举实例甚多。此外,何先生对“中学”与“西学”之争、五四运动、胡适、新儒学等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作者将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读来有如亲耳聆听先生的讲话。

关于作者

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清华(西南联大)读研究生。何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何兆武先生发表、出版过数量颇丰的论文和译著。他的散篇论文收入《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论文集。此外,《中国思想史》经他用英文改写,也已出版。近二十年以来,何先生在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方面不遗余力,与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这些译著包括:《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古代)、《论历史》、《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历史哲学——导论》、《德国的浩劫》、《法国革命论》、《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人类解放的故事——为思想权利而斗争》等等。

目 录

序	(1)
第一讲 谈有关西方文化史的介绍	(1)
第二讲 谈“中学”与“西学”	(7)
第三讲 再谈“中学”与“西学”	(22)
第四讲 传统与近代化	(56)
第五讲 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	(69)
附录:本土和域外——科学发展的条件	(85)
第六讲 五四与近代中国的启蒙——兼论胡适 ...	(111)
第七讲 交流与反思	(127)
第八讲 中西文化与全球化	(150)
第九讲 共性与个性——展望新的世界文化	(176)
附录:观照与超越——何兆武先生访谈录	丁 东(193)

第一讲

谈有关西方文化史的介绍

传统的历史学著作都是着重于写政治史,而于文化史则很少注意,无论中西,概莫能外。例如,汉武帝伐匈奴应该算是古代规模最大的战争了。每一次战前都要做好几年的准备工作,养好十万八万匹马,由大将军、骠骑将军率大军出云中、雁门,大体是经由蒙古、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向西绕道中亚的草原和沙漠,由西域入玉门、阳关回国。且不说要进行的是生死交关的战争,哪怕是和平性质的旅行,在古代的条件之下又是如何可能的?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交通和通讯、地理知识、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和运输,等等,一支十万八万人的旅行团又怎么可能进行这样一场迢迢万里的大规模的旅行?我们现代人简直难以想像。可惜的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例如两位司马)都没有着

眼于物质文化史而给我们留下多少材料。我们对此只好是凭自己的臆测了。

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政治军事转到思想和文化上面来,在西方也是 19 世纪末叶的事。中国方面对世界文化史的了解,哪怕是一部初步的教科书,也要从 19 世纪的末叶算起。当时的广学会——这是一个由西方传教士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是最早传播西学的重镇,但也传播了不少糟粕——出版的书籍中有一本书叫做《泰西新史揽要》,作者是英国人麦思西,原名《十九世纪史》。这是一本浅薄可笑、见解荒唐的通俗读物,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夕进呈光绪皇帝的阅读书目中就列有此书,因为当时还只有这样一本读物,可见戊戌时代知识储备的贫乏。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西方文化史才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是在那位思想异常敏锐的梁启超老先生的主持之下,人们读到了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的中译本。韦尔斯是以作家的身份更有甚于历史学家的身份而享有盛名的。他的这部风行一时的巨著确实是眼界开阔、布局宏伟,令人有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他不但能够放眼全人类的历史(这是至今也很少有专业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的),而且能放眼宇宙,把人类的历史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加以叙述,全书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讲自然演化史的。在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上,他或许比不上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在为读者开拓广阔的视野上,却是专业史学家无法

望其项背的。同时,此书又一扫专业史学家狭隘的政治斗争观点的陋见,而能重视人类文化活动的价值;例如,书中有专门篇章介绍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贡献,可谓为历来专业史学家的梦想所不及;狭隘的专业史学家是连科学家的名字都排不上队的,更不用说是音乐家了。然而,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Talleyrand,当时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Castlereagh,当时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这里就表现出了一种博大深远的历史眼光。

在五四以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几部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是值得一提的。一部是梅尔茨(Merz)的《十九世纪思想史》,原书四卷,1914年伦敦出版。此书内容丰富、体大思精,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可惜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对少数专业工作者而外,不太适合一般读者,所以虽有中译本却不为广大的读者群所熟知。另一部是桑戴克(Thorndike)的《世界文化史》。此书的中译本一厚册,是一部通俗性的教科书,内容平易,颇为易读,被有的学校指定为参考书。书名虽然号称世界文明,实际上重点仍放在西方,这是一般西方著作所难免的通病。这一时期国内最流行的西方史教科书是海斯、蒙和魏兰三人合作的《世界史》一书。海斯和蒙两人还曾合写过西方《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是当时各大学西洋通史的标准

教科书,是文科学生必读的。另外,海斯还写有《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一书,有中译本。随后,他在此书基础上又写了一部《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这是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学生必修课西方近代史的教本;此书共上下两大卷,上卷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下卷自工业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斯的书,文字平易流畅,条理清楚、脉络分明,也有其思想和见地,例如他强调没有经济的民主就没有政治的民主,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犹早十年。大约今天年龄较大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部书都还是耳熟能详的。

解放后,最初的世界史读本是中译本苏联科斯明斯基等人编的三本通史教材,其中古代和中世纪都嫌过于简略,只是简而不明的中学教本。近代部分论述较详,从法国大革命讲起。但苏联作者在分期方面显得举棋不定。按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近代史应该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然而这个“近代”应从什么时候算起?最初,是从法国大革命算起,因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典型的形态。其后,又改为从英国(清教)革命算起,因为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最重要而又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英国革命早于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而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书中竟然没有交代,仿佛英国革命之后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国革命,显得颇为不伦。何况英法一水之隔仅二十六英里之远,两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形态亦绝无相差一百五十年

之理。尔后,又认为尼德兰革命更早于英国革命,所以又把近代提前到尼德兰革命。按《资本论》的提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散见于15世纪末意大利地中海上的各城市,到了16世纪的最初三十年间即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近代史的开端就应该置之于此,那就和西方史学著作一般均置之于文艺复兴时代,恰好同时。

近代有近代的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传统的思想文化,较早的苏联教材在这方面着墨不多。等到中国读者读到苏联科学院多卷本的皇皇巨著《世界通史》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由于政治大气候的影响,这部巨著并没有像过去的苏联教材那样受到重视。尽管这部书也不免当时苏联所流行的一些教条与僵化的缺陷,然而无论如何它代表了当时苏联学术的水平,内容丰富,论述全面,不但体系完整而且能重视思想文化的历史地位,不像一般历史书籍只偏重政治经济而忽视文化。遗憾的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当前俄国的学术思想动态,国内介绍得太少了,使我们中国读者对于过去是那么熟悉的近邻和样板,竟然变得是那么地陌生。

与此同时,西方的学术著作却在大量引入。能引入当然是好事,这有助于繁荣我们自己的学术。很难想像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是封闭的国家,有可能在学术上置身于先进的行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缺点也是有的,饥不择食或食洋不化大概就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大量涌入的

并非都是精品,尤其是介绍者或翻译者由于某种现实利益的驱动,往往粗制滥造,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使得学术质量有日愈降低的危险;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必要的基础还没有来得及打好,比如西方哲学名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至今还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就是一例。

我以为就西方文化史的介绍工作而言,似乎不妨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介绍西方的基本经典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方面是介绍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书、教科书或研究成果(如伯奈特、于伯威格、文德尔班、罗素和柯普尔兰等人的哲学史)。关于西方文化史的著作,即如上述海斯的《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虽非学术经典,但不失为一部风行已久的入门教材,而几十年来竟然无中译本。近些年来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布林顿的《西方思想史》,布鲁诺夫斯基、伦达尔、伯恩斯等人的著作也未见有中译本。最近看到了新出版的拉尔夫等人《世界文明史》的中译本上卷。这应该真是一部较全面的概括性的综述,但又正因为如此,在思想的深度上面显得颇为不足。继此之后,能不能考虑一下把另一位伯恩斯(Harry Elmer Barnes)三大卷的《西方思想文化史》翻译出来作为一部高一级的综合性的参考书?同时也希望能把更多更好的一些重要的原著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或学术著作逐步介绍给一般读者和专业的研究者。选择要更精当一些,工作要更认真一些,这应该是对我们介绍和研究西方文化史工作的起码要求。

第二讲

谈“中学”与“西学”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近年来已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领域之一,有关的著作日渐增多;然而有些著作往往缺乏深入的研究,敷衍成文,不免予人以浅薄空洞之感。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研究者要想取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心得和创见,就不能急功好利,不能指望仅凭借粗枝大叶之功而收立竿见影之效;相反,它需要作者通过长期的积累而掌握中西文化方面的深厚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严谨、独立的分析和思考。

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民族危亡在于旦夕。有识之士憬然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足以应付近代化这一历史课题的挑战,遂纷纷将目光转向学习西方,呼吁维新与自强。在

起初一个阶段,人们学习西方大多只着眼于“夷人”船坚炮利之“长技”;以后经历了若干次的挫折和教训才体会到,中国在科学技术之外还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在学习西方的早期先驱者群中,应该数郭嵩焘和严复独具慧眼,两人在英伦时曾就中西文化异同日夜议论不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遂在我国思想界形成一个高潮。

不过,任何一个词语,例如中学或西学,只能是在一个给定的历史条件(具体语境)之下才有意义,脱离了具体语境便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在中国思想史上,19世纪后期的“中学”、“西学”,20世纪前期的“左派”、“右派”均是显著的例子。当年的“中学”、“西学”是各有其具体内涵的,由于当年的具体语境早已时移势去,如今再空洞地谈论中学、西学,便有可能成为毫无意义的假问题了。简单说来,所谓中学、西学者至少有两层不同的涵义,一种是地理上的,一种是心态上的。在地理意义上谈论中学西学无非是指某种学术最初源自于某个地方,例如几何学源于希腊(或更早是埃及),而并非意味着它就是希腊人所垄断、独占的专利,因为别人也可以学几何学,而且可以青出于蓝,学得比他们更好;在心态意义上讲中学西学,则无非是指某个民族由于其历史文化的积淀而形成了某种思想习惯的定势,例如中国传统思想方式中的伦理中心主义。一个民族的心态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并非是先天注定非如此不

可的。以色列人并非是先天地生来就赋有崇拜耶和华的基因,崇拜耶和华是他们后天历史文化的遗产。既是后天形成的,就会随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所谓中学西学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先天给定的、不可变易的,双方之间仿佛有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双方本身的自性又是永远不变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在不断彼此交融、互相作用的,并在此过程之中不断发展着和变化着。因此所谓中学西学或中西文化并没有永世不变或根本不可改变的内涵,虽说同时在某个给定的时刻它又因确有其具体的内涵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正由于各种文化彼此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交流、碰撞、吸收、融会和改造,所以它们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并因此而丰富着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使之日新又新。今天的世界要比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地联为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联为一体就要以牺牲各民族的多元化为代价。反之,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正如越是个性化的才越成其为社会的。世界之丰富多彩,就正是出于诸多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元化,正如每个民族文化之丰富多彩是由于每个成员的独特性与多元化。一个民族的文明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它永远是一多相融,多寓于一,一寓于多(variety in unity, unity in variety)。全人类的文化亦然,统一(unity)不是齐一(uniformity)。怀特海(A. N. Whitehead)曾强调指出过,齐一性的福音书乃是人类进步的大敌。所谓中

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并不能归结为一个抽象不变的概念。我们只能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脱离了这一语境就变成了无根之谈。希特勒和罗斯福是西方文化,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也是西方文化。孔孟是中国文化,老庄也是中国文化,五行讖纬是中国文化,阿 Q 也是中国文化。再如,当代学人陈寅恪先生是服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的,而这一口号是清未经张之洞的标榜得以广泛传播的。然而陈先生所理解的中学与张之洞的中学便大有不同。张之洞《劝学篇》的重点在于维护“君为臣纲”的君主专制制度。陈先生虽“生为帝国之民”,却在青年时即已入民国之世,通读他的著作我们看不出有一点点君为臣纲的思想。三纲的另一条目是男权主义的“夫为妻纲”。陈先生毕生伉俪情深,晚岁的压卷之作歌颂的是风尘女子柳如是,自谓是“著书惟剩颂红妆”,都足以反映先生对女性之尊崇。这样,在“中学为体”这同一个词语之下,张之洞和陈先生两人就各自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陈先生称自己的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但究其实质却是与“湘乡”、“南皮”大有出入的。由此可见,如果不将中西文化等范畴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加以考察,就不免会陷于文字的魔障之中。这是比较文化研究所不可不察的。

历史上所谓“中学”与“西学”既有其可比性,又复有其不可比性;过去人们所谓的“中学”与“西学”与今天人们所